

政治文化：過去、現在與未來

黃秀端*

- 一、前言
- 二、政治文化的定義
- 三、研究方法上的爭論
- 四、政治文化變遷的問題
- 五、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
- 六、政治文化與經濟發展
- 七、國內在政治文化的研究

本文回顧自六〇年代以來對政治文化的研究。在文中首先探討政治文化的定義。學者對於如何定義政治文化至今仍有相當多的歧異，較有共識的部份是政治文化作為一個科學概念應更為明確，並且須考慮社會關係的互動。

如同對政治文化定義的爭議，對於如何測量政治文化亦缺乏共識，其最大的問題在於如何表達出文化的集體特質。

對於政治文化變遷的問題也因政治文化途徑往往引導我們強調「連續性」，以致無法適當地解釋文化變遷本身。

最後，究竟是政治文化影響政治體制的運作和經濟發展，抑或是政治因素及經濟發展影響政治文化，亦是近年來學者經常爭論之議題，然而要證明此種因關係之存在並非易事。

關鍵字：政治文化、政治符號、文化變遷、公民文化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

東吳政治學報/1997/第八期/頁 47-85

一、前言

早期有關政治文化的研究多傾向於對各國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之研究，然而有關民族性之研究多仰賴作者主觀的印象，缺乏客觀的資料。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1963）是第一位利用政治文化理論從事跨國性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的學者。他們發現一個國家民主制度的順利運作與否，受到該國政治文化的影響。由於他們的貢獻，使得政治文化之研究得以從過去之僅憑文字上之印象，到可以測試之假設；也使得政治學界掀起了政治文化研究之熱潮。

七十年代，由於許多學者將政治文化視為殘餘變項（residual variable），凡是不能用其它因素解釋的，就用政治文化來解釋，反而使政治文化喪失了其解釋力，再加上理性抉擇理論的興起，政治文化理論完全被拋在一邊，因此對於政治文化之研究曾經沉寂一時。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期，Aaron Wildavsky 在 1987 年美國政治學會的演講－"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提出政治偏好根植於政治文化的觀點，並且主張政治文化應成為重要之研究計劃（research program）。同時，Ronald Inglehart（1988）在"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一文更進一步指出政治文化研究的復甦。因此，在多位學者（Wildavsky, 1987; Inglehart, 1988, 1990; Eckstein, 1988）的帶動下，政治文化研究又再度興起，成為熱門之研究領域。Harry Eckstein（1988:789）甚至稱政治文化理論之測試是「政治學研究議程中唯一最重要之項目。」Almond（1993:ix）亦表示政治文化之研究又「再度回到比較政治的領域裡」，而從近年來政治學界的研究成果，包括期刊與書籍之出版，便可看出此種端倪。

儘管政治文化在比較政治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不可磨滅的地位，但其間的爭議亦不少，從對於政治文化的定義本身到採取什麼樣的研究方法皆爭論不休，而採取何種方法又經常受到使用定義的影響。除此之外，對於政治文化

的解釋力或其所扮演的角色也有相當分歧的看法。究竟政治文化只是一個背景變數，還是確具有科學上對政治行為的解釋力呢？這方面的爭論包括，是政治文化影響政治結構或政治變遷，還是政治因素決定一切？又或者是由政治文化決定經濟的發展，還是經濟的發展影響了政治文化呢？

本文的目的在檢視自 Almond and Verba 一書之後，政治文化研究之發展以及重要爭論。第一部份將討論政治文化的定義，並提出對這些定義的批評，第二部份則將討論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及其所面臨之困境；第三部份討論政治文化變遷的問題，第四部份和第五部份則分別探討政治文化和政治結構以及政治文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最後一部份則將介紹台灣目前政治學者對政治文化的研究。

二、政治文化的定義

自從 Almond and Verba (1963) 的著作發表之後，有關政治文化的定義不勝其數，任何與政治有關的認知 (perceptions)、信念 (beliefs) 和價值 (values)，皆曾被稱為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可以是意識形態 (Bluhm, 1974; Wilson, 1992)，可以是政治心理 (Putnam, 1973)；可以是民族性 (Fitzgibbon & Fernando, 1981)，可以是民族主義 (Ranum, 1975)；可以是政治思想的灌輸 (Fagen, 1969; Solomon, 1971)，可以是對思想灌輸的反抗 (Almond, 1983; White, 1984)；可以是民主價值 (Rochon & Mitchell, 1989)，也可以是政治符號 (Edelman, 1972, 1988; Dittmer, 1977a; Williams, 1981)。

然而政治文化若要成為科學的概念，要用來比較不同國家的政治文化或行為，則必須要適當的被定義。本節將討論幾個政治文化的代表性定義，並進一步討論這些定義的優缺點，以及是否足以用來解釋政治行為。

最經常被使用的政治文化定義是 Almond and Verba (1963) 在其《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一書中所下的定義。他們視政治文化為系統中的成員對於政治的態度和取向的模式，此種態度和取向代表政治系統中成員的一種

主觀的心理取向，是政治行動的基礎，並賦予政治行動以意義。接著，他們又把個人取向（orientation）分為三部份（p.15）：認知取向（cognitive orientation）、感情取向（affective orientation）以及評估取向（evaluational orientation），分別表示個人對政治系統的知識、感覺與評價。同時民眾對於政治事務（political objects）的取向又可以分為四個部份，以系統為整體的部份、輸入、輸出、以及個人在政治系統所扮演之角色（p.13）。假如政治文化包含認知的、感覺的與評價的三部份，那麼當探討文化的結構間的關係時，此三個面向之間的交互關係，以及他們分別與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皆應被考慮進去。然而最後Almond and Verba把主要焦點放在主觀的政治能力感（political competence），換言之，只強調心理的或感情的取向層面（Pateman, 1980:67）。

Almond and Verba 強調的是系統中個人特色的整體分配狀態。此種定義經常被批評為以個人特性之集合來觀察文化整體，犯了方法上的個人謬誤（individualistic fallacy）（Dittmer, 1977a:555；Chilton, 1988:422）。Lowell Dittmer 進一步指出，假如政治文化能被化約為社會人口中態度之分配，那麼獨特的概念架構和研究界限的需求在哪裡呢？同時，若以政治取向來定義政治文化，也無法將政治文化概念與政治心理學（political psychology）區分。

另外一個經常被提及的是，Almond and Verba 的文化概念所扮演的角色究竟為何？作為一個科學的概念，它所能夠解釋的又是什麼呢？（Street, 1993）Almond and Verba（1963：74）指出，文化有維持和改變政治系統的作用，在五國政治文化研究中發現，政治系統中成員的態度與該系統的特色和運作有關，特別是參與型的政治文化，有助於民主的穩定，然而，Pateman（1989：67-68）認為，該書中對於民主應如何定義並未加以著墨，同時民眾支持的價值如何影響他們所居住的政治系統，也並未預期地受到 Almond and Verba 的關注。Barry（1978）也覺得，雖然 Almond and Verba 提供了豐富的政治態度調查訪問資料，但卻未提供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這些態度與該國的實際政治系統運作的關係。

儘管有如此多的批評，Almond and Verba 的定義卻是最被普遍使用的定義，因為此種定義的採用適合於用調查訪問的方式來比較不同社會的政治文化。

除了從政治心理的取向來定義政治文化外，另一重要的分支是從政治溝通或符號的角度來定義政治文化。本文以 Dittmer 的作品來討論，Dittmer 企圖將符號與溝通結合來界定政治文化。Dittmer (1977a) 認為以政治符號 (political symbol) 來定義政治文化者，往往不易將政治文化與語言或政治結構區分開來，因此他重新將政治文化界定為，政治文化是「一個政治符號的系統，而此種系統是構築於一個更具有包容性的系統，我們稱之為政治溝通」(Dittmer, 1977a: 566)。政治符號是政治文化分析的基本單位，而政治文化可以經由符號語言體系 (semiological system) 來加以了解。一個語言符號體系包括兩種類型變數的關係，即溝通變數 (communicative variables) 與語言學變數 (linguistic variables)；溝通變數包括至少兩個在溝通網路中的行動者，即溝通者與接受者，此兩位行動者透過符號 (sign) 來加以溝通；語言學部份包括一個符號，此符號有 signifier (通常為 word)、a referent (empirical datum signified) 和 a signification (lexical meaning of the sign) (Dittmer, 1977b:67)。在政治文化系統中，相關的行動者為菁英與民眾，他們的關係是透過溝通功能 (communication function) — 菁英操縱符號 (symbols)，而群眾解釋符號並對此加以反應 (Dittmer, 1977b:67)。既然符號的政治對話在溝通過程中被使用，因此就定義而言，Dittmer 的政治文化不再只是指個人的特性或態度 (Chilton, 1993: 425-426)。然而若如 Dittmer 所言，每一種符號只有在一個較大的符號系統中才具有意義，那麼文化與文化間之比較便相當困難；同時 Dittmer 雖然提到我們仍可用調查訪問來測量政治文化，不過他並未提出一個客觀可以測試的標準，因此仍留給我們如何測試政治文化的疑問。

Wildavsky (1987) 企圖提出一個更具簡約性和解釋力的文化理論，他認為政治偏好 (political preferences) 乃根植於文化之中，亦即文化可以解釋不

同範疇之偏好。此種偏好不是外生的，亦即來自系統之外，相反地，偏好是內生的（*endogenous*），是來自於爲了保護和反對不同生活方式的社會互動。當個人做某些重要決定時，這些選擇同時也是文化的選擇——不同社會實踐模式中共同分享的價值正當化（*shared values legitimating different patterns of social practices*）。在文化理論中，共同的價值和社會關係總是在一起的，沒有任何空洞的價值脫離他們所合理化的社會關係，沒有任何社會關係人類不給他任何的理由或不企圖去辯論他們的行爲；人們在決策過程中建立起他們的文化，在不斷的加強、修正和拒絕現存的權威關係中，教導他們偏好什麼。同時，根據兩個不同問題的答案，Wildavsky（1987：6-7）將文化分爲四種不同類型，這兩個問題是：我是誰（*Who am I?*）和我該怎麼辦（*What shall I do?*）。前者是認同的問題，其答案可以是個人屬於一個強有力的團體，其決定可以束縛所有成員，也可能團體的束縛力是微弱的，只能限制他們自己，而無法及於他人。後者是行動問題，其答案可以是個人受到許多規範的限制，或是受到很少的限制。

強有力的團體束縛力加上許多規範之限制，構成了階層的文化（*hierarchical culture*）。強有力的團體加上些許的規範限制形成了平等的文化（*egalitarian culture*），少許的規範限制配上微弱的團體束縛，是爲個人主義的文化（*individualistic culture*）。最後，當團體的束縛力微弱而規範限制卻很多時，決策權是在團體之外，而不是他們自己，Wildavsky 稱此爲宿命的文化（*fatalistic culture*）。

個人主義的理想是自我限制（*self-regulation*）。他們喜歡透過討價還價的方式來減少對權威的需求，支持公平競爭的機會以減少外來的干涉，他們並且尋求不同而非相同，因爲企圖減少任何的社會差異需要一個權威來做重新分配。相反地，階層的文化則有制度化的權威，爲了要使人與人之間在一起更爲和諧和有效率，他們認爲專業與分工是必要的，因此不平等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換言之，階層化是被合理化了，部份應該爲整體而犧牲。

在平等主義文化之下，權威是被拒絕的，除非更平等，他們可以生活於

無強制與無權威之下。因此可以預期他們偏好去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歧異，包括種族之間、收入之間、家長與子女之間、性別之間、師生之間以及權威與公民之間。至於宿命的文化起於人們無法控制發生於他們身上的事物。因為他們的邊界是具滲透性的，而加諸他們身上的規範是那麼的嚴苛，對於未來無助的感覺因而產生；他們對政策不會有任何偏好，因為他們的偏好是無濟於事的。

Wildavsky 強調文化的形式是來自社會的互動，同時文化認同的產生是來自於文化與文化間的衝突。政治文化本身不再是一個用來分類的靜態概念，而且不像 Almond and Verba 把文化視為個人態度的集合。

Ruth Lane (1992) 指出，在 Wildavsky 的努力下，文化不再只是殘餘變數 (residual category)，文化理論已有能力成為解釋政治行為的理論。強調政治文化本身就是一種理性 (rationality)，Lane (1992: 374) 指出，此種文化理性 (culture rationality) 的觀點擴張了用狹窄的經濟學途徑來解釋人類行為；換言之，Wildavsky 的文化理性並未排除理性的研究途徑，而是包含了它。不同文化的動機原則也許包括企圖去極大化經濟效率，但是經濟的理性並不是政治學中唯一理性化的基礎。

本文作者亦偏向於採取 Wildavsky (1987) 對於政治文化的概念，但是他並未指出政治文化與政治民主化之間的關係。在哪一種偏好形式之理性下，民主化才會形成？或者如果不同的偏好或理性的產生在於當時的決策環境，是不是先有民主，文化的模式才會變遷？很顯然地，宿命的文化和階層的文化似乎與民主的主權在民和政治平等原則並不相符合，而平等的文化又充滿了矛盾；如何一方面減少權威，一方面又追求平等呢？是不是個人的文化與民主的原則較能相行不悖呢？

Wildavsky 著重於理論發展，並未提供太多的暗示談論如何測量政治文化的問題，如何將此概念化定義加以操作將是一個難題。

儘管八〇年代後，政治學者體認到文化、價值的重要性，因此重新燃起對政治文化的研究興趣；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我們仍無法克服如何定義政治

文化的問題（Gibbins, 1989:13）。每一種定義都可能被批評得體無完膚，比較有共識的部份是學者們多不同意將政治文化等同於人民的心理取向（Chilton, 1988; Street, 1993; Lane, 1992），而其趨勢為文化必須置於整個社會脈絡中去了解，因此在定義上較會考慮到社會關係的互動。如何將政治文化概念適度反映文化整體的概念，同時又能適當的加以操作化，仍是政治學者相當重要的挑戰。同時，大部份學者也多同意，政治文化要作為一個科學的概念，必須要更為明確，並且可以作經驗性的測試，以及預測政治行為。

三、研究方法上的爭論

政治文化的研究不僅在定義與因果方向上有爭議，在研究方法上亦有相當多的歧異。方法上的爭論包括：用何種方式測量政治文化較為妥當？用調查訪問資料的個體層次分析，是否能夠解釋總體的政治體系呢？

如何測量政治文化？

每一種研究方法皆有其優缺點，然而政治文化的研究所面臨的問題尤其多。首先就調查訪問、內容分析及觀察法所面臨的問題來加以討論。

1. 調查訪問的使用

Almond & Verba (1963) 乃是使用調查訪問方式來測量政治文化之先鋒，然而調查訪問需要龐大的財力、人力及精力，而文化的研究為避免受文化限囿又常須做多國比較研究（Rosenbaum, 1975），此時需要投入的財力、人力與精力，將隨著國家數目之增加而呈現倍數上升。更困難的是，多國比較需跨越語言上的困難，對這些國家之文化之深入體會，以及對其歷史背景相當程度的了解（Verba, 1980:398）。

Almond & Verba (1963:57) 提到，在多國調查訪問研究上以等值問題（problem of equivalence）最為棘手。要達到等值性目標，首先要克服的是語言問題。當我們將問卷題目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時，其所代表

的意義在此兩國家是否相當呢？換言之，在不同的文化中是否可以找到同值的對象，即使找到，在訪談的情境中，它們所代表的是不是同值的刺激呢？同時，不同文化中，使用該概念的頻率可能不同，且受訪者對其熟悉程度亦有差異。

除此之外，不同國家之受訪者對於問卷調查之熟悉程度不同，英美兩國民眾對於調查訪問方式耳熟能詳，較願意接受訪問，有些國家之民眾則不願多與陌生人交談，義大利民眾表現出較不願合作之態度。Almond & Verba 調查的五個國家皆為民主國家，然而對於非民主國家，往往因政府嚴格監控或民眾噤若寒蟬，調查訪問便難以進行。

就訪問情境的刺激而言，在時間點上對所有國家同步進行訪問，會使研究者分身乏術，難以同時顧及各國情況。即使同步進行，Almond & Verba 發現，因各國政治情況不同，訪問情境刺激還是會有差異；例如某個國家可能正值選舉如火如荼在進行，而某些國家則平靜無事，進而造成訪問結果之差異。

不管是等值性的訪問題目或是等值性的訪問情境，目的皆是為了達成對於不同國家政治態度或行為的有意義比較（Almond & Verba, 1963:61），如何選擇等值面向之政治行為以及測量這些面向之指標亦是一大挑戰。某一類型的政治行為在某些國家具有政治上之意義，在某些國家卻無任何意義。

在抽樣上，在戰亂人民流離失所、戶籍不清楚、地圖標示不明顯、或交通不便利之地，皆相當難做到科學化抽樣，因此不少開發中國家的調查訪問很難做到全國性的隨機抽樣，如 Mitchell A. Seligson 和 John Booth A. (1993) 的尼加拉瓜研究樣本僅包括四個主要城市。Ada W. Finifter & Ellen Mickiewicz (1992) 在蘇聯開放後，對蘇聯民眾政治態度的大規模調查，雖然他們在抽樣上已儘量具有代表性，但他們發現蘇聯有十五個共和國，各共和國的語言文化不一，且幅員廣大，故只能選擇在幾個重要據點抽樣，樣本誤差因而難以推估。

調查訪問所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巨視與微視的問題，此將留待稍後再

討論。

2. 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是利用客觀有系統的方式來分析溝通的訊息（communication message），並從中作推論之技術。我們可以利用某一個社會市民生活所產生的傳播媒體、官員演講、文件、小說、教科書內容來推論該國的政治文化。

Richard Fagen（1969）想要知道卡斯楚政權究竟想要教育古巴的年輕人什麼樣的政治思想與政治規範，於是他使用古巴小學生使用的共黨青年手冊來加以分析編碼。另外有 Richard Wilson（1970）分析台灣小學生的教科書，Charles Ridley et al（1971）則分析中國的教科書。內容分析對於這些不易做調查訪問或調查訪問受到嚴格限制之國家，不失為另外一種可行的方式。然而政府所企圖教育人民的內容，與人民實際的想法或價值，差別到底有多大呢？換言之，我們所測量到的或許只是傳播者的想法，而不是接受者之想法。除此之外，一個社會所產生的傳播訊息太多了，究竟要分析哪些報紙、哪一位小說家的作品、或是哪些政府文件呢？

Richard M. Merelman（1991）以電視連續單元喜劇、雜誌廣告、社會研究書籍以及企業出版品等溝通訊息內容，來分析美英加三國之政治文化，這些溝通媒介對作者而言，具有集體的代表性（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然而 Merelman 亦承認民主國家中有多元的溝通媒介，而每一種媒介都製造那麼多訊息。同時，政府本身也是重要的溝通者，如：競選廣告、資訊小冊子和行政命令等。最後，企業界亦發行內部刊物、大眾市場出版品以及廣告等等。面對幾近泛濫的資訊，我們將如何選擇呢？有什麼樣的分析架構可以將他們融於一個單一文化系統中分析呢？當在做多國分析時，又如何選擇可以比較的溝通訊息呢？其結果往往是不完全的（incomplete），因此 Merelman 將其書名取為 Partial Vision，而不是 Complete Vision。

3. 觀察法（Observation）

人類學家對於許多部落族群的研究常採觀察法，到某個地區設身處地從事觀察。觀察法可以幫助我們深入了解當地人民的文化風俗與政治信念等，

然而一個成功的觀察往往需要長久的時間，且一個人所能觀察的範圍有限，因此這種方式可能適合於對一個小社區進行研究，但並不適合對一個國家做整體觀察（江炳倫, 1983:58）。

個體與總體的連結

Almond & Verba (1963:3) 認為政治文化概念提供了個體與總體政治中的連絡橋樑，即個人政治態度與政治結構之間的連接。文化具有集體性的特質（property of collectivity），以問卷調查訪問個人的方式，是否足以代表此種集體性的特質呢？若是全國有四分之三的老百姓都具有權威性人格，是否就能以此推論該國具有權威的文化呢？

Almond & Verba 把焦點放在文化與結構之間的關係，然而此種關係需要以國家作為分析單位(Lijphart, 1980:43)，此種情況便可能犯了 Erwin Scheuch (1969) 所說的個人謬誤(individualistic fallacy)，從低層的觀察開始，來推論較高層次的系統單位。Pateman (1980:68-69) 認為，在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之間需要其他變數存在，提供他們一個互動關係解釋的基礎，而政治社會化的概念足以提供個體與總體層級間的連結。

Almond & Verba (1963:73) 聲稱，雖然他們只是討論個人，並未觀察他們之間關係的互動，但在問卷中有問到他們對其他人的態度、他們與他人的關係、他們的社會行動、他們的組織成員和他們的政治行動，而不僅僅是個人的態度取向而已。

Verba (1980:402) 則更進一步辯護，使用調查訪問資料來處理總體政治問題，是因為資料本身是比較的。假如我們的研究範圍或使用的資料只限於某一個政治體系，那麼就無法將態度的模式與政治系統的作用關連起來，因為後者只有一個值，沒有變異。Verba 認為 Scheuch 對於個人謬誤的指責並非正確，因為他們處理的是民眾的態度，是具有總體的特徵，而不是只是個人的態度而已。

爾後對於政治文化的研究儘管對於政治文化的定義有所差異，然而多數

的學者仍是以調查訪問的資料為主，只是在定義上不再強調個人的心理取向，而較強調社會關係的互動。但是強調社會關係之互動，是否就能解決問卷調查所產生個體與集體的問題？Merelman（1991）認為每一個人對社會的理解是部份的，曲解的，集合人民的意見並無法解決部份與扭曲的問題。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對於用什麼方式方能真正測得政治文化之內容，仍舊是分歧，而對於總體與個體之間的連結也未能真正的解決。如何解決個體與總體間的緊張關係，仍是未來相當重要的課題，而此種緊張關係的降低，需要多種方法同時採行。

四、政治文化變遷的問題

政治文化途徑往往引導我們連續性（continuity），因而無法適當地解釋變遷本身。Almond & Verba（1963）認為參與的政治文化與民主的政治結構相互一致，政治運作方能順利穩定，但是這樣的說明並無法解釋不穩定的可能性，也無法指出究竟在如此穩定的環境中，變遷的可能性扮演的角色（Girvin, 1989）。在一九七〇年代已有不少學者對英美兩國是否能維持原來的穩定產生疑慮。他們認為英美兩國的政治文化與二次大戰前相比，已經經歷了相當程度的變化（Abramowitz, 1980; Kavanagh, 1980）。但是 Alan I. Abramowitz（1980）發現，美國民眾態度改變的部份在於對政治人物挖苦與譏諷的比例增加，對政府的信心逐漸降低，同時民眾的政治知識與練達水準卻增加了。另一方面，整個政治體制的正當性並未受到民眾嚴重的質疑或挑戰，民眾對於政治社群的忠誠度也未動搖。因此，Abramowitz 所說的變遷是否為真正的政治文化變遷呢？還是只是因為當時的越戰、水門案、種族歧視等問題，使得人民對政府和政治人物的態度發生改變，但是基本的文化並未改變。

Brian Girvin（1989）卻強調在幾個自由民主國家中，政治文化的連續性。他認為強調連續性並不表示忽略變遷的部份，而是由於在此過程中政治文化

本身連續性之強度，變遷的部份已經被吸收，而文化本身的核心價值並未被改變，在連續性中的變遷強化了政治文化的穩定性，因此許多自由民主國家雖然在 1970 和 1980 年代面臨一些挑戰，並未破壞總體層次的政治文化，改變的僅是個體層次部份，有些改變甚至會影響到介於總體與個體間的中間層次（mesolevel）而改變了遊戲規則。然而由於政治文化在大部份社會中最具有彈性，因此足以吸收改變而不干擾其核心價值。對 Girvin 而言，英美長期的穩定便是政治文化本身的同化效果。

但是要成功的同化必須要基於幾種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文化必須適當的反映國家認同的感覺。假如政治文化不能吸引人民的忠誠，那麼變遷將會造成困難；假如改變是來自外來壓力，自然會引起反抗，假如改變被視為可能威脅到核心價值，當然會遭到拒絕。換言之，Girvin 認為文化的變遷是自然的，是由於文化本身的彈性，而文化融入或同化的過程必須是新的內容與現有結構相混合才能允許變遷滲透整個系統，而同時保留社會之價值。中間層次的結構是個人態度與總體文化之連結，但是 Girvin 對於政治文化變遷的說明並無法解釋為何德國能夠在短期之內透過政治的力量來塑造新的政治文化，而未遭遇強烈的抗拒？

Dalton (1994) 在東西德剛統一後的幾個月內對東西德人民的調查訪問，發現東德人民對民主積極的態度反而勝於西德人民。Dalton 認為此種態度可能是四十年來逐漸形成的，且此種態度的形成並不是來自東德政權，而是來自外來世界，即西德。儘管東德用盡各種政治社會化的媒介來向人民政治洗腦，但是他們的改造卻未成功，民眾反而接受了外來的另外一種文化。對於此種情境，Girvin 的文化變遷亦無法提供適當之解釋。

Eckstein (1988) 企圖以文化理論的前提來建立文化的政治變遷理論。透過一般認知的、情感的和評估的經驗，民眾將經驗化為行動，此種傾向的模式因社會而有不同或因社會的某部份而與另外一部份有所差異。此種變化並不是因為社會情境或結構之變數，而是在於文化決定之學習；早期學習限制了後來的學習，而且學習牽涉追求一致性傾向的過程。追求一致性是爲了

經濟化其決策行動和同時達到社會互動的預測性。

Eckstein (1988) 考慮兩種類型的文化變遷：一種是自然的變遷，此種變遷來自於情境與結構情況的自然變遷；另一種是來自於人爲的策略，有計劃地企圖去改變政治結構和行爲。

情境的變遷包括模式維持的變遷 (pattern-maintaining change)，朝向更有彈性的變遷 (change toward flexibility)，以及文化的不連續性 (cultural discontinuity)。前者是屬於緩慢的變遷，後者則是當社會情境發生重大變化，模式維持的變遷與緩和文化的僵硬性皆無法處理社會的變動時，文化便可能呈現不定型狀態 (formlessness)，因此 Eckstein 稱之爲文化的不一致性。

政治變遷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利用政治權力和策略來發動政治社會結構的急速變革，是造成文化不一致性的另外一種情況。當文化失去了整體一貫性的結構時，老百姓大致上會有三種不同的反應 (Eckstein, 1988:797)：

對政治權威陽奉陰違，對事則心存投機取巧，不時有雙重道德標準出現。

退縮 (retreatism)。自較大且不熟悉的社會，退縮至較小且熟悉的環境。

對權威採取反抗或不妥協的態度。此種不定型之情況將會持續一段時間，直到個人和團體對於行動之規則和預測感到需要甚爲殷切時，文化之模式或主題才會出現。

在 Eckstein 的想法中，緩慢的文化變遷是正常的，可以了解的，而且是有用的；但是快速的文化變遷則是不尋常，難以維持，而且是危險的 (Werlin, 1990)。所以 Eckstein 的結論中仍看不出文化的動態面，當衝突的民主參與產生時，也無法提供真正的保證來促進政治變遷 (Merelman, 1991:238)。

除此之外，Inglehart (1977) 也談到政治文化變遷的問題，他認爲西方世界近幾十年來已經經歷了一段由物質主義轉換成爲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變遷。他對於文化變遷的解釋是基於社會化理論以及馬師婁的需求層級理論 (Maslowian need hierarchy theory) 兩者之混合，他認爲人類的態度與價值

在早期便已內化成爲自己的一部份，難以更改。同時，人類的需求因環境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物質匱乏的時代，民眾的需求與價值自然與繁榮富裕的時代有所區別，新生一代的市民因生長在優渥的環境下，因而有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而整個社會的價值變遷是由新生一代慢慢取代舊的一代，而逐步變化，因爲舊的一代在早期形成的物質主義價值已經根深蒂固，不太容易因爲現在環境的改變而變化。由此可見 Inglehart 對於政治文化變遷的觀點依舊是緩慢的，連續性的，而不是急遽的，快速的。

由以上分析可見，文化理論學者雖然想辦法解釋文化的變遷，但是由於文化本身便含有連續性的意味，使得他們對於文化變遷的解釋缺乏說服力，特別是對於快速的文化變遷，文化學者無法解釋爲何德國會在短短的二十年內由臣屬的政治文化轉變爲參與的政治文化。Eckstein（1988）只好把德國視爲異例（deviant case），而 David Contradt（1980）則以家庭及學校社會化的作用以及當時無其他的政權可以選擇來解釋。但是爲何此種社會化的作用會如此快速？爲何家庭中父母對孩童的教養方式會突然由權威式的轉爲較不具權威式的呢？在此方面，政治文化理論學者有必要更努力尋求答案，如果文化本身無法變遷，那麼用文化來解釋政治結構或經濟發展，則將使很多國家永無翻身之地。

五、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

政治文化作爲一個有意義及有用的概念，必須要能夠解釋某種政治現象或政治行爲，但是學者們對於政治文化在民主政治的運作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看法相當分歧。究竟是政治文化決定政治結構，或者文化只是個背景變數而已，真正的決定原因是政治因素？此問題牽涉到政治文化的解釋力，以及因果關係的方向性。

Almond & Verba（1963）的《公民文化》一書是第一個有系統地企圖用文化變數來解釋民主的結果的研究。他們研究英國、美國、西德、意大利和

墨西哥五國之政治文化發現，英美兩國之所以能維持穩定的民主在於其有參與的政治文化。他們認為唯有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相一致，亦即參與的政治文化與民主的政治結構、臣屬的政治文化與傳統的政治結構、以及地域型的政治文化與原始型的政治結構，政治局勢方能穩定。不過在該書中，他們把政治文化視為自變數，民主的穩定視為依變數，即先有民主的政治文化，方有民主的政治結構。但是為何一個社會中個人的態度會對政治的運作有所影響呢？Almond & Verba 認為答案在於政治文化連結了個體政治（micropolitics）與總體政治（macropolitics），因此為個人的行為與系統的行為搭建了一座橋樑。儘管如此，多數學者認為 Almond & Verba 並未提供足夠的證據以顯示其間的因果關係。

同時不少研究民主轉型的學者把焦點放在政治變數，文化變數只被視為是一個提供菁英政治行動的背景變數而已。

Robert Dahl（1971）在多元政治一書中，提到多元政體國家，以英國和瑞典的民主發展途徑最為成功。在此兩國中，政治上遊戲規則之建立以及競爭性的政治首先發生於菁英份子，然後及於他們有關係的親戚朋友，再慢慢地將其他階層之社會團體加以社會化。

同樣的，Dankwart A. Rustow（1970）的民主轉型焦點也放在菁英變數。民主政治建立是由於菁英的抉擇與互動，然後菁英與選民再逐漸適應與習慣此種遊戲規則。Lijphart（1968）對於荷蘭民主發展之研究亦得出雷同之看法。以上幾位學者的民主發展模式皆是同樣從一小撮菁英開始發展，而菁英的決定是關鍵性的，而且他們的關鍵性抉擇往往是基於策略的考量，而非價值之改變；換言之，若不採取民主方式，其所付出之代價與社會成本會更高，是他們的考量。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1986）以及 Adam Przeworski（1986）都認為，一個國家成功地由威權體制轉換為民主體制，必須有其客觀情勢。這些客觀情勢包括：適當的經濟發展，貧富差距的減少，多元化之社會結構，市場取向的經濟，以及較具容忍和妥協的政治文化。但是只具備

有客觀條件，威權體制並不會自動成爲民主體制。換言之，客觀因素並不直接決定民主之成敗，他只不過是在某種具體的歷史情況中，限定了民主化的可能性。政治因素，如：政治領導，政治菁英的策略和行動，以及他們之間的衝突和妥協，方是直接決定是否建立民主體制之重要因素。在他們心目中菁英份子佔有決策之戰略地位，對於國家體制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政治文化不過是背景因素而已。

近年來學者對於拉丁美洲、西班牙等國家之民主轉型研究，也多強調菁英份子之克制、妥協、和對民主之承諾的互動關係(Di Palma, 1990; Whitehead, 1989; Linz & Stephan, 1989)。在拉丁美洲和南歐的菁英和民主鞏固一書中，Burton, Gunther 和 Higley (1992) 認爲，一個新興民主政體要能長久穩定存在，必須等到民主鞏固的完成，民主鞏固的建立須仰賴廣泛菁英共識團結存在，菁英之共識在現代社會中主要透過兩種方式來達成，一爲菁英間的妥協與和解 (elite settlement)，另一爲菁英態度的凝聚 (elite convergence)。在同一本書中的另外幾篇文章都是將焦點放在 elite settlement 與民主轉型和鞏固的關係，如：Richard Gunther (1992) 的西班牙，John A. Peeler (1992) 的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委內瑞拉，Alan Knight (1992) 的墨西哥，Maurizio Cotta (1992) 的義大利等。

對於這些學者而言，政治文化只是被視爲是一種政治過程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相反地，提出政治文化復甦論的學者 Inglehart 則堅持 Almond & Verba 的傳統與基本假設，強調文化決定政治結構的形式。Inglehart 把文化視爲是一個社會中普遍分享的態度價值和知識體系，並且將此一代傳給一代。他用人際關係的信任感 (interpersonal trust)、對生活的滿意度和是否贊成革命的變遷作爲測量文化之變數。人際關係的信任是組織團體的先決條件，而團體的形成又是民主遊戲規則能否被遵守與運作的要件；對生活的滿意度能穩定反映出國與國之間不同之文化規範，而與該國所使用之語言及短期客觀之經濟情況無關；是否贊成用革命方式來改造社會或以漸進緩慢之方式進行改

革，則牽涉到民眾是否願意以討論妥協或投票等方式來達成目標。

Inglehart (1988, 1991) 在檢視歐美等二十多個民主國家後發現，民主穩定國家皆存在此三項共同之文化特徵，較高程度之人際關係信任感，對生活滿意度，以及反對革命的變革等，而其因果方向是文化影響民主的穩定與發展。幾年之後，Inglehart (1997) 將分析國家增加為 43 個，除了原來的歐美國家外，加了東歐、南美和亞洲等國，而其結果更進一步肯定政治文化對民主穩定和維持的重要性。

繼Inglehart之後，陸續有不少政治文化的著作出現。Merelman (1991) 在其 Partial Vision 一書中，比較英、美、加三國自由主義的文化，企圖去解釋任何政治行動背後所創造的意義；他認為「一個社會的大眾文化會很巧妙地為尋求政治參與及歡迎團體衝突或拒絕政治參與及拒絕團體衝突作準備」。自由主義的傳統加上特殊的歷史條件，使得此三國各自產生了特殊的政治參與文化，而Merelman則熱衷於找出不同形式的政治文化與政治實踐的關係，然而Merelman的研究還是無法提供文化與政治之間的因果關係。

Allan Kornberg & Harold D. Clarke (1992) 的 Citizens and Community 一書中，利用詳盡的調查訪問資料來分析不同層次的政治支持與民主穩定之間的關係，但是政治支持並不如想像中的穩定，而加國的民主是穩定的，另外，他們也缺乏比較資料來支持他們的假設。

同樣採取 Almond & Verba 調查訪問資料之傳統，David J. Elkins (1993) 不認為民主的問題在於政治社群中百姓的支持與否，而是在於對議題具有強烈態度的少數份子之集合。他放棄 Almond & Verba 公民文化的分類，建議真正使民主維持的因素不在於文化的實質內容，而在於大家是否有超越黨派的「什麼是最顯著的政治爭論的議題面向」的一般看法。然而和其他學者一樣，Elkins 雖然企圖去回答民主政治是如何運作的，但由於他的研究對象只有英屬哥倫比亞，在方法上只能顯示政治練達水準高的民眾在民主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卻無法證明前者。

與 Almond & Verba、Inglehart、Merelman 等持相反觀點的是 Seligson &

Booth (1993) 對尼加拉瓜和哥斯大黎加兩國之比較。選擇尼國和哥國在設計上是基於最大相似系統設計 (most-similar system design)：兩國同樣是貧窮小國，以天主教為主要信仰，並在地理上互為鄰國。儘管兩國在各方面有許多相似之點，但兩國卻有不同的政治體制；哥國是拉丁美洲中最古老而最穩定的國家，相反地，尼國卻有著拉丁美洲最暴力的政治傳統，長期在專制獨裁統治之下，一九九〇年以前從未有經由自由選舉過程的和平政權轉移。

根據尼、哥兩國之歷史，Seligson & Booth 認為，如以 Inglehart 的理論來推論，哥國的政治文化應較尼國的民主，但依其研究結果發現，實施民主政治多年的哥國政治文化並未較尼國的更具有民主取向，因而對 Inglehart 之研究提出質疑。但 Seligson & Booth 的尼國樣本只包括了四個主要城市，哥國樣本卻包括了都市和鄉村地區的人口，因此而得出的結論另人感到懷疑。此外，尼國近年來亦開始實施民主政治，並且經歷了由左派到右派的和平政權轉移，是否是因為其民主文化價值取向使得該國得以在短期之內完成和平政權轉移，有待我們作進一步觀察。

Edward N. Muller & Mitchell A. Seligson (1994) 更進一步以歐美及拉丁美洲等 27 個國家為對象，檢驗公民文化與民主間之因果關係。他們發現人際關係之信任是民主政治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如同 Inglehart 所言，是民主政治發展之因。影響民主政治發展最重要的因素為該國人民平均收入是否平等，換言之，越是貧富不均之國家，越容易與民主反其道而行。唯一與文化有關的變數是贊成漸進改革，反對革命變遷的比例，但是其影響力遠不如前者。Muller & Seligson (1994:647-48) 的結論是民主政治體制之發展才是決定民眾思想價值之因，因此建議將來應把重點放在菁英之態度，因為菁英比一般民眾有更多之機會和更大之能力來左右國家政體之方向。不過 Muller & Seligson 仍舊缺乏長時期的觀察，因此在因果關係的掌握上並不是那麼清楚。

對於共產國家的研究成果遠比對於其他國家研究具有共識 (Gibbins, 1989)。共產國家的所謂馬列革命菁英強加新的社會主義人的文化於傳統文化的歐洲，但是學者咸認為此種實驗是失敗的 (Brown, 1984; Jancar, 1984;

White, 1979; Almond, 1983)。

近年來被Laitin (1995) 視為最具有震撼性和突破性的政治文化作品為Putman (1993) 的Making Democracy Work。Putman針對義大利包括南、北各地共 20 個地區政府作分析，這 20 個地區在 25 年前皆採取同樣的政治體制，但是同樣的制度設計並未使各地區政府有相同之民主運作與政治效能。地方政府間運作之差異，不僅存在於南北之間，也存在於南部或北部。Putman發現造成此種差異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經濟發展的程度，而是在於文化的因素，當文化因素引入時，經濟發展程度的影響力便消失了；文化因素會影響社經發展，但社經發展卻無法決定市民文化。他的主要論點在於市民社群 (civic community) 是導致較有效的政府運作與民主的重要因素，而所謂的市民社群是指民眾具有較高程度之政治興趣、社會平等、人際間的信任以及自發性的組織。他更進一步強調此種文化的規範與習慣強化了市民社群，即使是遭遇外來的破壞，包括法西斯政權，其文化的基礎依舊存在，且影響政治的發展。

Putman 的研究之所以具有價值，是因為在研究設計與方法上有相當大的突破。在方法上，他充份運用多元方法，或稱之為三角交叉檢視法 (triangulation)，包括調查訪問、形式理論 (formal theory) 以及歷史分析法。他採取調查訪問法來測量民眾的態度，但他並未像其他學者 (Kornberg & Clarke, 1992) 一樣，利用調查訪問資料來測量政府的輸出，相反地，他採取了客觀指標來測量政府的輸出，避免與民眾的評估混淆。Putman 更進一步用博奕理論 (game theory) 協助回答經驗性發現中所提出的問題，使理論與經驗性研究相互結合。最後，他採取歷史和背景分析之資料來更進一步證實博奕理論和統計分析的結果相符合。在研究設計上，他選擇了 20 個在制度設計上相同的地區政府，因此控制了制度的因素，而在統計上他也能控制經濟發展的因素，在因果關係的掌握上較具有說服力。

Elkins (1979) 認為要證明文化的解釋力，首先必須是不同文化的比較，既然文化具有整體的特性 (property of collectivity)，唯有經由不同文化之比

較才可能有變異；同時，Elkins 認為必須要先排除同樣具有集體性的結構與制度因素。但 Almond & Verba (1963)、Elkins (1993)、Kornberg & Clarke (1992) 等多人的研究皆無法達到此種標準，Putman 關於義大利的研究對於強調經濟發展、社會聯盟以及菁英策略的理論則是一大挑戰。

綜合以上諸位學者的研究，對於政治文化和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究竟何者為因，何者為果，就如同雞與蛋的問題一樣，難以得到完美的解答 (Inglehart, 1988)。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要得到適當的解答，首先要做長時期的觀察。其次要在該國之政治文化或政治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之情況下，我們方才有機會找出兩者之間的關係。此外，如何適當的控制其它變數，也是不可缺少之條件。

六、政治文化與經濟發展

另外一個引起爭論的問題是，文化是否會影響經濟發展？此種傳統可以追溯至 Max Weber (1958)，強調基督教主義對於歐洲現代化的關鍵性影響。在宗教改革之前，南歐地區的經濟原較北歐地區為進步，但在宗教改革後三世紀，資本主義興起，其主要發生在新教徒地區，這些地區的經濟呈現一種動態的發展，很快地就在經濟上超越了天主教的歐洲。當然還有其他因素影響此種變遷，但是 Granato、Inglehart 和 Leblang (1996) 認為，證據顯示文化因素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建立在韋伯的理論之上，David McClelland (1961) 發現在有些社會經濟成就的價值經常被強調，而有些社會則很少強調。透過對孩童故事書和教科書之內容分析，間接去了解該社會所強調之價值，McClelland 發現，在教科書中較強調經濟成就之社會，其經濟發展快於不強調者。

以上述為前提下，Granato、Inglehart 和 Leblang (1996) 建立一個成就動機指標，強調節儉 (thrift)、勤奮工作 (hard work) 甚於服從 (obedience) 以及宗教信仰 (religious faith)，企圖用文化態度來解釋經濟的成長。

利用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 Survey）的資料對 25 個國家分析，他們的研究結果證實，成就動機的文化價值，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力大於經濟因素本身，至於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的影響力，在加入經濟因素和教育因素之後便消失了。當然，Granato、Inglehart 和 Leblang 並不認為文化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經濟和教育皆相當重要；但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且是經濟因素本身所無法取代的。另外，在一本對 43 個國家的研究中，Inglehart（1997）也有相同的發現。

不過此種經濟成長部份決定於文化因素之觀點遭遇到不少抗拒，其中很重要的理由是，文化價值本身是穩定的，難以改變的，如果文化因素可以決定經濟因素，那麼有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是毫無前景可言的。另外一個理由是來自經濟的論點，認為標準生命循環模式（standard life cycle model）已足以解釋國與國之間儲蓄與經濟成長的差異。

Robert W. Jackman & Ross A. Miller（1996）利用 Inglehart 使用的資料，並控制了 1980 年的 GDP per capita，發現在控制 GDP p/c 之後，文化因素的影響力便減弱或幾乎不存在。他們因此聲稱，文化對於經濟成長或政治結果皆不具影響力，真正影響各國差異的因素是制度（institution）。制度結構了個人政治行動的動機分配，個人在這些制度的制約下，企圖去極大化其利益。制度的變遷改變了政治行動者可利用的機會，因而進一步改變了他們的行為。但是 Jackman & Miller 對於為什麼他們要控制 1980 年的 GDP p/c 的理由並不是很充份；同時，Jackman & Miller 對於文化測量之指標也與 Granato、Inglehart 以及 Leblang 不同。另外，Granato、Inglehart 以及 Leblang 分析 25 個來自不同地區的國家，而 Jackman & Miller 則只將焦點放在工業先進國家（Swank, 1996:664）。後者的樣本過於同質化，因此難以發現文化與經濟的理論關係。

兩篇文章所使用的經驗性模式亦不相同。Granato、Inglehart 以及 Leblang 採取經濟學上最新使用的內生成長模式（endogenous growth model），並採取不同的統計方式來處理，但 Jackman & Miller 則未如此處理。

最後，兩篇文章的時間點亦有相當大的差異，Granato、Inglehart 以及 Leblang 的觀察時間較長（1960-1989），而 Jackman & Miller 的時間點較短（1980-1988）。

由此可見 Jackman & Miller 對於 Granato、Inglehart 以及 Leblang 文章的挑戰有許多令人質疑之處。

Swank（1996）反對 Jackman & Miller 認為比較政治學者應放棄文化對於民主與經濟表現的影響理論的主張。Swank 認為文化因素絕對不會是一個不相關的因素，不過他提出以社群政體（communitarian polities）的變數來取代 Granato、Inglehart 以及 Leblang 的動機成就指標。他認為某些政治結構之下，背後所隱藏的價值與規範會有助於制度之運作與經濟成長，而社群政體，如亞洲的日本、台灣、南韓、中國以及香港等國所代表的 Confucian statist 社會，以及歐洲的奧地利、丹麥、芬蘭、挪威和瑞典所代表的社會統合主義（social corporatist）國家，則具有此種功能傾向。社群政體透過兩種機制來促進經濟成長，首先是其背後所隱藏的價值足以克服經濟上集體行動的困境，如 rent-seeking 和 free-riding 行爲。Confucian statist 社會強調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特別是對於團體認同與團體利益的強烈取向，以及社會對於共識的強調，鞏固了政治制度。強烈的團體認同以及尊重層級式的秩序轉換公民－國家關係，成為有助於經濟政策上的執行。

社會統合主義則承認，團體成員和集體組織在社會統合政策，同時存在小型、開放和同質化政治經濟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促進了相關組織的發展。除此之外，強調社會伙伴之間的共識與集中（consensus and concentration），使得工商業界與勞工聯盟能在國家協調的談判中，達到對總體經濟和工業政策之共識，並更進一步鞏固了政治上的共識。

第二種機制則是集中與共識等價值之強調有利於政治穩定，政治穩定減少經濟上投資的風險，增加更多的投資，進而促進經濟的成長。

根據 Swank 分析的結果，社群政體對於經濟成長確實有顯著影響，而 Granato、Inglehart 以及 Leblang 的動機成就指標在加入社群政體變數之後，

其顯著水準便消失了。若是將動機成就模式與社群政體模式相互比較，Swank（1996）發現社群政體對於經濟成長之解釋力遠高於動機成就。

Harrison（1985, 1992）是主張文化因素決定經濟發展，甚至政治現代化的學者。他曾經擔任美國國際發展署（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駐拉丁美洲哥斯達黎加、瓜地馬拉和多明尼加共和國等國之代表，在這些國家先後待了十三年。在這幾年中每天與當地人民接觸的結果，他發現傳統的伊比利文化與價值對政治多元主義、社會正義和經濟發展的阻礙，因此促使他於1985年出版一本名為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The Latin American Case的書，來闡述文化如何對進步產生阻撓。七年之後，Harrison（1992）出版另一本書－Who Prospers? How Cultural Values Shap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uccess。該書中除拉丁美洲國家外，Harrison（1992）更比較了東亞的韓國、日本以及台灣，企圖建立一套更完整的理論來解釋為什麼文化對於經濟成長，甚至政治運作具有決定性的力量，而且此種力量是長期而深遠的。

同時，Putman（1993）在他對於義大利地方政府的實驗發現，市民社群的文化不僅影響到上一節提到的政治運作，此種文化更決定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在Putman的因果關係模型中顯現的是市民社群的文化預測經濟的發展，但是另一個因果方向－經濟影響文化－卻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如同Granato、Inglehart和Leblang（1996）對於25個國家的分析，Putman（1993:157）的結論是，文化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遠高於經濟因素本身。

究竟是文化影響經濟發展，還是經濟因素影響文化，就如同前節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一樣難以解答。Inglehart（1988, 1990）雖然證明文化的影響力對經濟發展之決定性遠大於經濟因素本身，但是Inglehart本身亦不否認經濟亦可能影響文化，特別是他對於歐洲後物質主義興起原因的解釋之一，便是來自於經濟情況的影響。但是Putman、Harrison以及多位研究東歐共產國家的學者，則對於文化影響經濟的因果方向較為肯定。

七、國內在政治文化的研究

江炳倫（1973）是國內最早從事政治文化調查之學者，然而當時科學化的抽樣尚未普遍，因此樣本並不具代表性。江炳倫之後幾年間，大部份學者的研究重點皆放在從小學至大學的政治社會化或政治態度研究。如 Richard Wilson（1970）對小學生的政治社會化研究，陳文俊（1983）的研究中學生以及陳義彥（1979, 1991）的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研究；另外，還有袁頌西（1971, 1977）對於國小學生政治功效意識分析，Sheldon Appleton（1970, 1973）探討大學生和高中生對民主了解的程度，彭懷恩（1978）的研究大學生之政治支持，以及胡佛（1975, 1979）對大學生民主與法治態度的調查。或許是因爲學生樣本的取得成本較低較易之故，因此焦點皆在學生；而這些研究在內容及方法上，基本上皆未脫離 Almond & Verba（1963）公民文化之架構。同時，除了陳義彥（1991）外，這些資料亦缺乏長期資料的分析（Wei, 1976）。

近年來則有胡佛和台大幾位師生致力於政治文化概念和理論體系的建立。他們對於 Almond & Verba 的架構有所批評，認爲該架構僅限於系統決策及執行的過程，而忽略角色行爲規範的結構。同時，他們認爲 Almond & Verba 在五國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未能把握「權力」和「正當」的文化概念，只是強調「能力」的主觀評估（胡佛、陳德禹、朱志宏，1978）。然而民主與極權國家之區別，無法用 Almond & Verba 之決策文化架構所能分辨，必須擴展至對權力自覺性與正當性之深入觀察。他們把政治文化視爲以權力關係的正當性爲中心的一種信念。而以此爲價值取向，可從三個不同的層面來觀察政治，亦即系統認同性的政治文化、系統結構性的政治文化，和系統功能性的政治文化。系統認同性的政治化是民眾對國家的國權整體權力的正當取向，系統結構性的政治文化則是對於系統中成員在構成系統結構中所擔任的角色的正當取向，其中包括系統成員之間、成員與結構之間、以及權威結構與權威結構之間究竟應該具有什麼樣的角色權力。根據此而形成五類權力關係的基本規範，分別稱之爲平等權取向、自主權取向、自由權取向、多元權取

向，以及制衡權取向（胡佛、陳德禹、朱志宏，1978，1980；胡佛、徐火炎，1983：61-64）。系統功能性的政治文化所取向的是影響權威機構或政府施政的參與權力，並根據此種權力取向而分為：改革權、要求權、干預權，與陳情權四種權力價值取向（胡佛、陳德禹、朱志宏，1978，1981；胡佛，1986）。更可貴的是，除了理論之建立外，他們又進一步根據此理論和概念製作一套量表，進行多次實證調查。他們得到的結論是，就系統結構性的政治文化和系統功能性之政治文化來觀察，我們正處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轉型期。

胡佛所領導的台大研究小組可以說是台灣目前第一位對於國內政治文化做有系統的理論建構及實證分析者，他們對於政治文化的定義較 Almond & Verba 進步，其努力與成果值得國人肯定。然而在概念上把「權力」視為文化的中心概念，是否真能反映文化的內涵不無問題。文化是無意識的，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是很難加以挑戰的；而權力則是有意識的，是經常被挑戰的。同時，「權力的正當性」是否為文化的唯一內涵亦值得深思。

另外，在多篇文章內（袁頌西、陳德禹，1988；胡佛，1988，1991）皆提到目前我國正處於轉型的政治文化，但在缺乏與他國文化比較之下，我們如何判斷我國是處於轉型的政治文化呢？不過目前該研究小組正在進行一連串有關中國文化地區的政治文化調查訪問，或許將來透過比較，得到的結論會較肯定。

另外，政治文化與民主之間的關係是國外近年來關注之焦點，然而在國內此方面的研究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張佑宗（1991）、黃秀端（1995）是僅有曾經處理此問題者。張佑宗把政治文化視為中介變數，一方面受威權體制與政治行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對威權體制及政治行動產生作用；但他用不同文化類型與威權體制之支持之差異來證明政治文化的影響力似乎欠缺說服力，充其量只能說兩個變數相關而已。同時，張佑宗所說的不同類型的政治文化是否能稱為「政治文化」呢？或許視為不同程度的民主價值取向與對政黨支持模式和政治滿意度較為妥當。

黃秀端（1995）企圖去分析解嚴前與解嚴後政治文化變遷的情況，但是

長期實證資料的缺乏，仍舊無法證明因果關係，將來在歷史及背景資料加強或許可以幫我們更進一步證明其因果關係。

由以上對國內政治文化研究之分析顯示，國內在此方面之研究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發展。

八、結論與對未來之展望

當 Almond & Verba 的公民文化一書出版之後，曾引起學者對政治文化研究之狂熱，一時之間成爲比較政治的顯學。然而在理性抉擇理論興起之後，政治文化頓時被打入冷宮，而其中很大的因素是對於政治文化的定義過於籠統，以及應該包含哪些變數並無共識。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的研究並無法預測西德的民主運作是否能成功，或是缺乏公民文化的義大利是否會因此造成民主的崩潰。套句 Lakatos 的話，該研究計劃（research program）並非「progressive」；因爲一個進步的研究計劃（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必須具有預測力。八〇年代以後，大家體認到文化價值之重要性，因此又回到對政治文化的研究。此段時期又正好碰到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開始，政治文化在民主化過程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亦成爲關注焦點。然而多數民主化學者寧可將政治文化視爲背景變數，而強調政治變數或菁英的重要性。

第二階段政治文化的研究雖然相當多，但是對於該領域中重要的爭執依舊存在，這些包括前面提到對於政治文化概念的定義，如何測量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否決定政治結構及經濟發展。Putman 的作品是所有作品中被認爲在因果關係設計上較具有說服力。由於 Putman 的著作賦予未來政治文化的研究新的生命，特別是尋求政治文化、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Laitin, 1995: 173）。從以上的文獻來看，我們可以得知，文化因素對一國之政治與經濟發展皆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政治文化的研究仍有其價值存在，但是對於政治文化的概念定義及操作型定義還是有改善的空間。胡佛等教授對政治文化的定義雖然較爲進步，但是把政治文化視爲權力的正當性

仍無法完全表達政治文化的內涵。再者，於方法上同時運用多元方法來檢證，而不須拘泥於某一種方法，質與量可以同時並行，以增加研究的效度。至於在政治文化的定義方面，則有必要更為明確。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台灣政治民主化近年來是有目共睹的，對於政治文化、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之間的關連更值得我們進一步的研究與了解，因為研究結果的暗示與民主是否能有效運作息息相關，這方的研究尚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開拓。

參考書目

- Abramowitz, Alan I., 1980,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Culture Under Stress." pp.177-211. In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eds.), 1980,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 Almond, Gabriel A., 1983,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s 15-2 (January):127-38.
- Almond, Gabriel A., 1993, "The Return to Political Culture." 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pp.ix-xii. Boulder: Lynne Rienner.
- Appleton, Sheldon., 1970,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Taiwan's College Students." Asian Survey 10 (October):910-923
- Appleton, Sheldon, 1973, "Regime Support among Taiwan High School Students." Asian Survey 13-8 :750-60.
- Barry, B., 1978, Sociologist,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an, J.M.W. (eds.),1987,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odern Britain: Studies in Memory of Stephen Kos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 Bluhm, W.T.,1974, Ideologies and Attitudes: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Brown, Archie (ed.),1984, 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munist Studie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Burton, Michael、Richard Gunther, and John Higley.,1992, "Introduction:Elite Transformations and Democratic Regimes." In Elit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p.1-37, editd by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lton, Stephen.,1988, "Defining Political Cultur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41:415-45.
- Conradt, David.,1980, "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pp. 212-272. In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Edited by G.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tta, Maurizio.,1992, "Elite Unification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Italy: A Historical Overview." In Elit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pp.146-177, editd by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obert A.,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lton, Russell.,1994, "Communists and Democrats: Democratic Attitudes in the Two Germanie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469-93.
- Diamond, Larry, and Juan Linz.,1989, "Politics,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In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Juan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Boulder: Lynne Rienner.

- Diamond, Larry.,1993,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pp.1-33. Boulder: Lynne Rienner.
- di Palma, Ginseppe.,1990,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ttmer, Lowell.,1977a, "Poil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29:552-83.
- Dittmer, Lowell.,1977b, "Thought Refor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An Analysis of the Symbolim of Chinese Polem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67-85.
- Eckstein, Harry.,1988, "A Culturalist Theory of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3 (September):789-804.
- Edelman, M., 1972, The Symbolic of Politics. 5th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Edelman, M.,1988, "Skeptical Studies of Language, the Media, and Mass Culture." Americ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1333-1339.
- Elkins, David J. and Richard E. B. Simeon,1979, "A Cause in Search of Its Effects, or What Does Political Culture Expl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January):127-45.
- Elkins, David J.,1993, Manipulation and Consent: How Voters and Leaders Manage Complexity.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Ellis, Richad J.,1993, Americn Political Cultu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gen, Richard.,1969,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uba.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nifter, Ada W. and Ellen Mickiewicz.,1992, "Redefin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SSR: Mass Support for Political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4:857-875.

- Fitzgibbon, R. H., & J.A. Fernando.,1981, Latin America: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
- Gibbins, John R.,1989,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Politics in a Postmodern Age , pp.1-30. Edited by John R. Gibbins. London: Sage.
- Girvin, Brian.,1989,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Liberal Democratic Political Culture"pp.31-35.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ulture,edited by John R.Gibbins.
- Granato, Jim, 、 Ronald Inglehart, and David Leblang.,1996, "The Effect of Cultural Valu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Hypotheses, and Some Empirical Tests." Americal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3 (August):607-31.
- Griffith, Ernest S., John Plamenatz and J. Ronald Pennock.,1956, "Cultural Prerequisitess to a Successfully Functioning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0:101-137.
- Gunther, Richard.,1992, "Spain: the Very Model of th Modern Elite Sttlment." In Elit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p.38-80, editd by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on, Lawrence E.,1985, Underdevelopment in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Lanham, MD: Madison Books.
- Harrison, Lawrence E.,1992, Who Prospers? How Cultural Values Shap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uccess.New York: Basic Book.
- Higley, John and Michael G. Burton.,1989, "The Elite Variable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Breakdowns." 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54:17-31.
-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 Culture,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onald.,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onald.,1988,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4 (December):1203-1230.
- Inglehart, Ronald.,1990,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ackman, Robert W. and Ross A. Miller.,1996, "A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3 (August):632-659.
- Jancar, B.,1984, "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17-1:67-82.
- Kavanagh,Dennis.,1980, "Political Culture in Great Britain: The Decline of the Civic Culture"pp.124-176. In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Edited by Gabriel and Sidney Verba. Boston: Little Brown.
- Kim, Yong C.,1964,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Politics (1964):316-336.
- Knight, Alan.,1992, "Mexico's Elite Settlement: Conjuncture and Consequences." In Elit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p.113-145, editd by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rnberg, Allan and Harold D. Clarke.,1992, Citizens and Community: Political Support in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ne, Ruth.,1992, "Political Culture: Residual Category or General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5-3 (October):362-387.
- Laitin, David. D.,1978, "Relig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Weberian

- Tradition." World Politics 30:563-592.
- Laitin, David. D.,1995,"The Civic Culture at 3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168-73.
- Levi,Margaret.,1996, "Social and Unsocial Capital:A Review Essay of Robert Putman's Making Democracy Work." Politics & Society 24-1 (March) :45-55.
- Lijphart,Arend.,1968,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Pluralism and Democracy in Netherlands. Bo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jphart,Arend.,1980, "The Structure of Inference"pp.37-56. In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 Linz, Juan and Afred Stepan.,1989, "Political Crafting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Destruction: European and South American American Comparisons," Pp. 41-61.In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Stopping the Pendulum, Edited by Robert A. Pastor.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McBeath, Gerald A.,1986, "Youth Change in Taiwan, 1975 to 1985." Asian Survey 26-9 (September):1020-1036.
- McClelland, David.,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 McClosky, Herbert and John Zaller.,1985, The American Etho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erelman, Richard M.,1991, Partial Vision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Brita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
- Muller, Edward N., Mitchell A. Seligson.,1994, "Civic Culture and Democracy: The Question of Causal Relationship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3 (September):635-52.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1986, Transitions from

- Authoritarian Rule: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 Pateman, Carole.,1971,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 (July):291-305.
- Pateman, Carole.,1980, "The Civic Culture: A Philosophic Critique." pp. 57-102.
In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 Peeler, John A.,1992, "Elite Settlemen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Colombia, Costa Rica, and Venezuela." In Elit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p.81-112, editd by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1986, "Some Problem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 In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Comparative Perspective, Vol. 4. Edited by G.A. in O'Donnell, P.C. Schmitter and L. Whitehea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Putman, Robert D.,1973, The Beliefs of Politicians: Ideology, Conflict,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and Ital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utman, Robert D.,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idley,Charles P.,Paul H.B. Godwin,and Dennis J.Doolin.,1971, The Making of A Model Citizen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Hoover Institute.
- Ranum, O. (ed),1975,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ist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 Reinarman, Craig, 1987, American States of Mind:Political Beliefs and Behavior among Private and Public Work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on, Bradley M.,1974,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Japan. Berkeley, Cal.: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Rochon, R.R., & M.J. Mitchell.,1989, "Social Bases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razil." Comparative Politics 21:307-322.
- Rosenbaum, Walter A.,1975,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Praeger.
- Rustow, Dankwart A.,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April): 337-364.
- Scheuch, Erwin K.,1969, "Social Context and Individual Behavior,pp.138-145." In Mattei Dogan and Stein Rokkan, eds., Quantita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chmitter, Philippe C. & Terry Lynn Karl.,1991, "What Democracy Is And Is not." Journal of Democracy 2-3(Summer): 75-88.
- Seligson, Mitchell A. and Edward N. Muller.,1987, "Democratic Stability and Economic Crisis: Costa Rica, 1978-1983."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1:301-26.
- Seligson, Mitchell A. and John A. Booth.,1993,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gime Type: Evidence from Nicaragua and Costa Ric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5-3 (August):777-792.
- Solomon, R.H.,1971,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reet, John.,1993, "Review Article: Political Culture- from Civic Culture to Mass Cultur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1:95-114.
- Swank, Duane.,1996, "Culture,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Recent Evidence, and The Role of Communitarian Pol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3 (August):660-679.
- Verba, Sidney,1965, "Comparative Political Culture," pp. 512-560. 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ited by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erba, Sidney,1980, "On Revisiting the Civic Culture:A Personal Postscript" pp.394-410. In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 Weber, Max.,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eprint. New York: Scribner's.
- Wei,Yung.,1976,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urrent Studie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Journal of Politics 38 (1976) :114-140
- Werlin, Herbert H.,1990,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1 (March):249-253.
- Williams, Raymond.,1981, Culture. London: Fortana.
- White, S.,1979,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viet Politics. London: St. Martin Prss.
- White, S.,1984, "Political Culture in Communist States: Some Problems of Thoery and Method." Comparative Politics 16:351-65.
- Whitehead, Laurence.,1989, "The Consolidation of Fragile Democracies: A Discussion with Illustrations," pp:81-94. In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ns: Stopping the Pendulum, Edited by Robert A. Pastor.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Wilson, Richard.,1970, Learning to be Chinese: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Children in Taiwan. Cambridge: M.I.T. Press.
- Wilson, Richard.,1992, Compliance Ideologis: Rethinking Political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davsky, Aaron.,1987, "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itions: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3-21.
- Wildavsky, Aaron.,1989, "A Cultural Theory of Leadership." In Leadership and Politics, p. 87-113. Edited by B. D. Jones. Kansas: Univesity of Kansas Press.
- 江炳倫，1973，〈臺灣地區人民政治文化與投票指向之調查研究〉，國立政

治大學政治研究所。

江炳倫，1983，《政治文化研究導論》。台北：正中書局。

胡佛，1975，《我國大學生對民主與法治的態度》，國科會研究報告。

胡佛，1979，「我國大學生對民主的態度-法律系學生的研究」，楊國樞等編，《當前臺灣社會問題》：111-134，臺北：巨流。

胡佛，1991，「民主政治的價值取向：一項實證性的探究」，韋政通編，《自由民主的思想與文化》：61-101，台北：自立報系。

胡佛、陳德禹、朱志宏，1978，「權力的價值取向：概念架構的建構與評估」，《社會科學論叢》，27：3-28。

胡佛、陳德禹、朱志宏，1980，《政治系統的權力價值取向及交互用：內湖地區個案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

胡佛、徐火炎，1983，「結構性的政治文化：概念類型及面向的探討」，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第三次社會指標研討會論文集。

袁頌西，1971，「兒童與政治」，《政治學報》，第一期，九月，頁 67-114。

袁頌西，1977，「家庭權威模式，教養方式與政治功效意識：景美研究」，《思與言》，10 卷，第 4 期，頁 35-55。

袁頌西、陳德禹，1988，「臺灣地區民眾的政治文化－系統結構的權力價值取向」，楊國樞、瞿海源編，《變遷中的臺灣社會》：299-326，中央研究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二十號。

張佑宗，1990，《民主轉型與臺灣政治文化的變遷——一九八〇年代》，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佛，1988，「台灣地區民眾對政治參與的態度：系統功能的權力價值取向」，楊國樞、瞿海源編，《變遷中的臺灣社會》：327-354，中央研究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二十號。

彭懷恩，1978，《中華民國大學生的政治支持》，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論文。

陳文俊，1983，《中學生的政治態度及其形成因素－青少年的社會化》，臺北：財團法人資訊教育推廣中心。

陳義彥，1979，《臺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臺北：嘉新文化叢書。

陳義彥，1991，《臺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究：十五年來政治價值與態度之變遷》，國科會研究報告。

黃秀端，1995，「台灣政治文化變遷與政治民主化」，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臺灣民主化回顧、檢討與展望，高雄。

Political Cultu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hiow-Duan Hawang

This article review the political culture literature since the pioneer work of the Civic Cultur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view of political culture used by Almond and Verba is inadequate both as an account of how culture works and of how it might explain political action and there is no return to the old approach. However, there is still lack of agreement on how it should be defined, how can it explain and how do we explain it. Particularly, there are a lot of debates o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work needed to be done in this area of research.

Keywords :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symbol, cultural shift, civic culture